

新村梦

中国人的

ZhongGuoRenDe
XinCun
Meng

赵泓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的 新村梦

ZhongGuoRenDe
XinCun
Meng

赵 泓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新村梦 / 赵泓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21-12110-3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6289 号

书 名 中国人的新村梦

责任编辑 夏 昆

装帧设计 梁嘉欣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4.75

定 价 38.00 元

自序

001

新村曾经是一代中国人的梦想。这一梦想源自古代大同思想，五四时与各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结合，进而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发展路径。

新村主义的创立者和系统阐述者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先驱武者小路实笃，他主张通过建立新村，使全人类过上“人的生活”，实现人人平等、劳动互助、友爱、幸福的理想社会。五四前后，经周作人等人的大力宣传，新村主义思潮广泛影响到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由于新村主义杂糅了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对现代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不啻 1920 年曾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团，我们从后来的“人民公社”、“半工半读”、“上山下乡”等历次运动中，都能找寻到新村的影子。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和中国无政府主义集大成者刘师复曾设计过类似新村的组织，但他们都是从无政府主义角度去构想新村的，且并未付诸实施。新村主义成为一种系统学说，并形成一股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则是在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创办《新村》杂志之后。将新村主义系统介绍到中国的是五四文化名人周作人。

五四时期受到新村主义思潮影响的不仅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且还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像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何孟

雄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曾被新村主义描绘的美景所吸引。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即梦想过一种“新社会生活”。1919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发表了他的新村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里面设想“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新村主义的传播直接导致了五四时期一场较大规模的乌托邦实践。轰动一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是新村——农村中的新生活移植到城市的结果，是“城市中的新生活”。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主要发起人和早期的灵魂人物，也是工读互助团的主要组织者，因此，本书对五四时期最大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有专门的介绍。事实上，少年中国跟新村一样，也是五四理想青年构想的一个乌托邦，我们从少中会员、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方法》一文中不难看出。

1919年底，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它是五四时期规模最大、影响广泛的工读互助团体。这一乌托邦组织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归于失败。其他地方的工读互助团也落得相同的命运。何孟雄、施存统、俞秀松等北京工读互助团成员后来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曾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的毛泽东等人，也是经过工读互助运动的洗礼，才迅速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新村和工读互助团在促使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上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但是，这些人接受的主要是暴力革命的思想，内心并没有放弃新村的梦想。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新村梦有了延续的可能。自1958年开始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的人民公社，到1966年根

据“五七指示”而设计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都是典型的乌托邦。“五七指示”大致源自青年毛泽东的新村梦想，跟《学生之工作》中的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更是可以从新村找到思想的源头。

新村主义对现代乡村建设运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乡村教育最早探索者王拱璧曾受到日本新村运动的影响，并于1920年在他的家乡河南西华县孝武营村创办了“青年村”。“青年村”具有新村和乡村建设运动双重色彩。上世纪30年代初，陶行知提出了普及乡村教育的构想，决心创办乡村工学团。他指出：“乡村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陶行知，1985[2]：593）这种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教育组织，和新村有很多共通之处。

乡村教育的倡导者均强调学者下乡，深入民间，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强调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知”与“行”、“工”与“读”相结合。在这一点上，乡村建设运动与工读新村主张桴鼓相应。所不同的是，乡村建设派认为农村的落后在于农民的愚昧，因而他们试图通过普及教育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新村主义者则主张“共产”、“互助”，希望建立大家一起生产共同生活的乌托邦。

本书不啻介绍新村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衰及新村运动始末，也试图分析这一思潮的成因及对历史走向产生的深刻影响。

中国文化传统中素有大同色彩，《礼记·礼运篇》里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更是千百年来久诵不绝。但历史上极少有

乌托邦实践，原因在于儒家观念中，“大同”只是出现在远古时代，后来由于人心不古，世风窳败，社会因此出现各种纷争和不平等。只有通过礼教的约束，使每个人成为谦谦君子，大同社会才有可能降临。到了近代，康有为的三世说颠覆了这种倒退的历史观，但他坚持渐进论，认为大同之世只能出现在未来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若轻言大同会引起大乱。所以，他写成《大同书》后长期密不示人。曾经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骨子里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充满向往，甚至主张“在理想的新村里，以不结婚为好。在这新村里，有很好的组织，里面有一人独宿的房间，也有两人同睡的房间，跳舞场、娱乐室，种种设备，应有尽有。当两人要同房居住的时候，须先经医生检查过。并且要有很正确的登记，如某日、某时、某某同房住。将来生出子女，便可以记号了。”家庭也是“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但他把这种理想社会寄望于全社会道德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故强调“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蔡元培，1999：196）五四时期，由于部分激进青年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奉为圭臬，认为人类社会不必经过漫长的进化阶段，通过互助手段就可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故现实中迅速出现了新村这种乌托邦实践。

新村和工读主义者认为劳心和劳力的分工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这种观念在五四时期遭到了彻底的颠覆，有些言论甚至具有反智倾向，类似数十年后“文革”语言。

如“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蠹民吗？”“几千年来教育的错误影响，可以用两句话表明出来，就是：有用的分子都没有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都是无用的人。”为何这时对待读书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转变，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原因很复杂，直接的原因是当时许多人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思想，我们从鲁迅写于1919年的小说《一件小事》中不难看出这一变化轨迹——一个思想的启蒙者，如何在底层劳工面前突然自惭形秽起来。

对读书人的贬抑也源于历史上重实践轻虚文的传统。在中国文化当中，历来是两种传统并存，一种是靠读书求取功名的传统，崇尚“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个人功利主义；另一种是经世致用的传统，强调“有用之学”。这两种传统均源自孔子的教诲。一方面孔子告诫人们读书的好处：“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另一方面，他反对死读书，认为读了书若不能学以致用，读得再多又有何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自清初以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极大地发扬了经世致用的传统，颜元就曾指斥腐儒们“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元，1987：107）毛泽东自幼深受颜元思想的影响，对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从内心瞧不起。有论者不明白青年毛泽东思想由来有自，甚至妄加猜测，认为跟他担任北大图书馆资料员时受文人歧视有关，其实大谬不然。

在新村主义者眼里，读书和劳动的分离，既造成了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不平等，也导致了人格上的分裂，影响了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所以，新村实行半工半读，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详细的规划。

新村虽然只是一个梦想，一个乌托邦，但它勾勒出的社会图景是美好的。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倡导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和谐，推崇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等等，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若彻底否定，就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看到，经过短短 30 多年，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很快成为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充斥社会每一个角落，互助友爱的精神几乎荡然无存。劳心与劳力的严重分离，使得知识分子与利益集团结合得更加紧密。那些曾经被讴歌的普通劳动者，不幸沦落到社会底层和边缘……

在这个没有梦想的年代，新村勾起了我们历史的记忆。五四那群踔厉风发的少年令人怀想。

透过新村，我们能找到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希望我们通过重温那段历史，重拾五四那群少年的梦想。

目 录

CONTENTS

001 | 自序

001 | 第一章 周作人与新村

- 一、周作人访日本新村 \ 003
- 二、周恩来仍记得 50 年前的那场演讲 \ 011
- 三、胡适的诤难 \ 015

021 | 第二章 新村运动的支持者

- 一、无政府主义者与新村 \ 023
- 二、李大钊号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 \ 031
- 三、毛泽东的“学生之工作” \ 037
- 四、恽代英的“未来之梦” \ 044
- 五、沈定一——“浙江最有天赋之人” \ 049
- 六、向往新村的学子们 \ 055
- 七、王拱璧和他的“青年村” \ 066

073 | 第三章 昙花一现的工读互助团

- 一、李超之死 \ 075
- 二、城市中的新生活 \ 081
- 三、短暂的共产生活 \ 089
- 四、上海工读互助团 \ 102

- 五、曦园和利群书社 \ 113
- 六、匡互生和工学会的实践 \ 117
- 七、工读互助组先后解散 \ 122
- 八、他们这样看待失败 \ 128

133 | 第四章 少年中国之梦

- 一、不可忘记的王光祈 \ 135
- 二、青春思潮与少年中国学会 \ 143
- 三、关于小组的讨论 \ 155
- 四、“让我们在战场上相见！” \ 162
- 五、分道扬镳的少年们 \ 169

173 | 第五章 新村与现代中国

- 一、乌托邦：从梦想到现实 \ 175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180
- 三、“五七指示”大放光芒 \ 187
- 四、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 \ 194
- 五、从“劳心者治人”到“劳力者治人” \ 198
- 六、传统与异端 \ 209
- 七、反动与颠覆：我们怎样才能避免悲剧？ \ 213
- 八、新村运动的启示 \ 217

220 | 主要参考文献

223 | 后记

1

第一章

周作人与新村

ZHOUZUORENYUXINCUN

我们劳动，
不被强而劳动，
看轻金钱而劳动，
为尽自己的义务而劳动，
为兄弟而劳动，
为人类而劳动，
便是辛苦也要劳动，
自愿的劳动，
独立独步的劳动，
喜悦便在这中间：
我们劳动！

[日]武者小路实笃原诗 周作人译
载《批评》第5号 1920年12月



-
- 一、周作人访日本新村
 - 二、周恩来仍记得 50 年前的那场演讲
 - 三、胡适的诘难
-

一、周作人访日本新村

周作人是五四以来的散文大家，也是历史上的一个漩涡人物。他在五四时期引人注目之处，一是擎起人道主义旗帜，倡导“人的文字”，为五四启蒙运动摇旗呐喊；二是倡导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新村运动”，并得到广泛响应，其中就包括被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所吸引的青年毛泽东、恽代英等人。

新村运动是由日本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 ~ 1976）发起的。武者小路实笃是日本近代文字的先驱，出身于日本上流社会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武者小路实世是子爵，祖父实藏为著名歌人。他幼年即进入贵族学校学习。青年时的实笃十分内向、孤僻，经常一个人苦思冥想。他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深受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作品的影响。他崇尚托尔斯泰的“躬耕”，希望以他为榜样来改造日本社会。

托尔斯泰身为俄罗斯贵族，以不劳而获为耻，每年三季作工，一季到莫斯科经营出版事业，并将自己的思想写作成书，印成许多小册子，拿到农民间散布。他提倡泛劳动主义，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不论什么人没有剥削他人劳动，掠夺他人成果的权力，主张要消灭人间种种罪恶，就必须每个人参加劳动，而且必须从事体力劳动。他指出人人参加劳动是建立平等



武者小路实笃
(1885~1976)，日
本小说家，新村运动
的倡导者。



宫崎县的“新村”
创立纪念碑。

社会的前提，不劳而获是罪恶的渊藪。通过体力劳动，那些剥削阶级，以及脑力劳动者可以洗刷内心的罪恶感。在这里，劳动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意义，因而也就被视为人生最大的义务，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善行。

1910年，武者小路实笃参与创办文艺刊物《白桦》，宣扬人道主义，呼吁人们和平、友爱、平等，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周作人对此极表赞同。

为了实践自己倡导的理论，武者小路实笃于1918年创办了《新村》杂志，宣传新村主义。同时，他在日本九州日向儿汤郡的一个偏僻乡村石河内村购置了40多亩耕地，盖了8间房屋，组织起20多个人，创办了日本第一个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町村——新村，并亲任理事长。不久，他又在东京、大阪、京都、神户、长野、静冈、北海道、横滨、福冈、爱知等地建立了新村支部。日向新村所在地原是一旧城遗址，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整个地势呈马蹄状，风景十分优美。新村分上、中、下城，靠海的地方是下城。实笃对新村生活作了具体的规定：每日值饭的人5时先起，其余的6时起来，吃过饭，7时到田里去，至5时止。11时是午饭，下午2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送去。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5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读书，10时以后熄灯。

周作人对实笃仰慕已久。他和实笃第一次通信开始于1911年。那年，《白桦》杂志登出购买增刊《罗登号》的广告，周作人去函预购，实笃没想到中国方面也有人《白桦》感兴趣，故对周作人有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每遇周作人来信，他都悉心

作答。1918年12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1919年1月，周作人在日记里提到下午收到日本新村本部稻垣芳雄的信。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这是中国有关日本新村的最初介绍，内容主要根据实笃的《新村的生活》一书来介绍新村的实践意义。他在文章里称赞新村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 Utopia 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英国诗人 Coleridge 等所发起的‘大同社会’ Dantisocracy 也因为没有资本，无形中消失了。俄国 Tolstoj 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个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通的人生的福音。”

周作人想亲自去新村看看。1919年7月2日，周作人携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从塘沽启程。6日，大客轮在几声鸣笛声中驶入日本门司港。周作人下船后即买了去日向福岛町的火车票。7日下午，他在福岛町转乘马车至高镐。我们从周作人后来发表在《新潮》2卷1号上的《访日本新村记》一文，可以体会到周作人踏上日向新村这片土地时的感受：

（这里）一面临海，一面是山林，马车在这中间，沿着县道前进。我到这未知的土地，却如同曾经认识一般，发生一种愉悦的感情。因为我们都是“地之子”，所以无论何处，只要是平和美丽的土地，便都有些认识。到了高镐，天又下雨了，我站在马车行门口的棚下，正想换车往高城，忽见一个劳动服装的人近前问道：“你可是北京来的周君么？”我答道：“是。”他便说：“我是新村的兄弟们差来接你的。”旁边一个蔽衣少年也前来握手说：“我是横井。”这就是横井三郎君，那一个是斋藤德三郎君。我自从进了日向已经很兴奋，此时更觉感动欣喜，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来，这两人便是首先来通告的。现在虽然仍在旧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迹，已能够使我信念更加坚固，相信将来必有全体成功的一日。我们常感着同胞的爱，却多未感到同类之爱；这同类之爱的理论，在我虽也常常想到，至于经验，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迹了。

平素以“世界公民”自居的周作人，似乎在这里找到了归宿感。当天，很少参加劳作的周作人在武者小路实笃、松本长十郎的陪同下，和新村的一帮弟兄们一起下地劳动：

当日他们多赴上城工作，我也随同前往。种过小麦的地，已经种下许多甘薯；未种的还有2/3。各人脱去外衣，单留衬衫及短裤布袜，各自开掘。我和第五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学掘地，但觉得锄头很重，尽力掘去，吃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时间，腰